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第十七屆人文及社會科學專題研究報告

指導老師：黃文斐

二二八學生行動與 1950 至 1970 年代的校風  
以建國中學和成功高中為例

學生：曾梓恩 撰

中華民國一一一年

# 摘要

現在高中生擁有相對自由的環境，然而回溯過往局勢動盪不安的年代，學生們的生活型態以及面對政局的態度亦是值得討論的議題，而隨著台灣逐漸民主化，過去一些不為人所知的事蹟才得以慢慢展開。本研究的目的即是釐清在日治時期到戒嚴時期前段的這段期間，台北市建國中學與成功高中關心時局的程度以及校風的演進。

**關鍵字：**校風、二二八事件、戒嚴時期、建中、成功高中

# 目錄

<b>第一章 緒論</b>	<b>1</b>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文獻回顧	1-2
第三節 研究法與論文架構	2
<b>第二章 二二八事件裡的建中和成功中學</b>	<b>3</b>
第一節 日治時期的臺北一中與臺北二中	3
第二節 青年學生參與二二八事件的背景	3-4
第三節 兩校參與的情形	4-7
<b>第三章 1950-1970 年代的兩校校風</b>	<b>8</b>
第一節 學校政策的發展差異	8
第二節 管教措施及學生的言論與行動	8-11
<b>第四章 結論</b>	<b>12</b>
參考文獻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現在高中生擁有相對自由的環境，然而，回溯過往局勢動盪不安的年代，學生們的生活型態以及面對政局的態度亦是值得討論的議題，而隨著台灣逐漸民主化，過去一些不為人所知的事蹟才得以慢慢展開。本研究的目的即是釐清在日治時期到戒嚴時期前段的這段期間，臺北市建國中學與成功高中關心時局的程度以及校風的演進。

## 第二節 文獻回顧

有關二二八事件中的史料，臺大歷史系陳翠蓮教授主編之《二二八事件與青年學生：二二八事件檔案專題選輯》蒐集了許多有關青年學生的第一手資料。至於論文的部分則是通常描寫特定的一兩間學校或者地區的學生進行研究，以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許雪姬主編之《二二八事件 60 周年紀念論文集》為例，關於青年學生的部分收錄四篇論文，前三篇分別介紹臺灣大學<sup>1</sup>、臺灣省立農學院<sup>2</sup>、延平學院以及建國工藝職業補習學校<sup>3</sup>在事件裡的情況及後續發展。最後一篇則是講述嘉義地區的學生在事件中的武裝反抗，除了描述嘉義本地中學生的反抗行動外，還有闡述來自臺南的省立工學院學生前來馳援的過程<sup>4</sup>。

上述文章缺乏對於臺北地區中學生的描寫，尤其是嘉義地區都有一定數量的中學生參與其中，臺北作為台灣政治中心，當地中學生理應也會對此事件有所反應，尤其自己身為建中學生，更加關心母校在事件裡的參與情形。

再看之後戒嚴時期的學生言論表現，本校第九屆人社班林宗緯學長撰寫之〈戒嚴時期之建中學生的言論—以建中青年為例〉即可找到一些線索。該作者嘗試用校刊分析學生言論，整體脈絡尚稱清晰，不過，筆者認為應該還有其他學校可供比較。

筆者研究二二八事件的相關資料，發現北部地區參與反抗的學校中，除了臺大等大專院校之外，以成功高中的紀錄較多<sup>5</sup>，由此同時，筆者更進一步試圖尋找建中學生的反抗事蹟，並且嘗試建立建中與成功高中校風形成的過

---

<sup>1</sup> 李東華〈二二八事件中的臺灣大學〉，刊載於許雪姬編《二二八事件 60 周年紀念論文集》，臺北市：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2007)，頁 173-198。

<sup>2</sup> 歐素瑛〈臺灣省立農學院與二二八事件〉，刊載於許雪姬編《二二八事件 60 周年紀念論文集》，臺北市：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2007)，頁 199-224。

<sup>3</sup> 陳翠蓮〈二二八事件後被關閉的兩所臺灣人學校〉，刊載於許雪姬編《二二八事件 60 周年紀念論文集》，臺北市：臺北市政府文化局(2007)，頁 225-254。

<sup>4</sup> 王昭文〈二二八事件嘉義地區的學生與武裝行動〉，刊載於許雪姬編《二二八事件 60 周年紀念論文集》，臺北市：臺北市政府文化局(2007)，頁 255-280。

<sup>5</sup> 歐素瑛〈二二八事件對校園的衝擊〉，刊載於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編《台灣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國際研討會》，臺北市：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19)，頁 103。

程以及彼此之關聯性。

### **第三節 研究法與論文架構**

本論文主要傾向於質性的研究，經由文獻探究完成。論文架構，則是先探討二二八事件裡兩間學校的行動規模以及參與方式，最後研究自日治時期至戒嚴前期兩間學校的校風及其轉變。

本文使用的「校風」一詞，通常涉及許多要素，例如：校方高層的政策措施、教師的態度、以及學生的言論行為等。以校方高層的政策措施來看，又能細分成校長背景與風格、生活管教的實施、以及課程安排等因素。筆者擬由校方出版品(譬如：校刊等)來分析觀察，也會從當年就學的學長回憶進一步了解當時的學校生活。

## 第二章 二二八事件裡的建中和成功中學

### 第一節 日治時期的臺北一中與臺北二中

今天的建國中學，是由日治時期的臺北一中、臺北三中以及臺北四中組成。不過，由於臺北一中的創校時間較早(西元 1898 年創立)，臺北三中(西元 1937 年創立)及臺北四中(西元 1940 年創立)的歷史相較之下較短，加上建中在精神上也以臺北一中的創立作為建中校史之起點，因此本文以臺北一中作為建中在日治時期的前身<sup>6</sup>。

日治時期的臺北一中主要由日本人組成，僅有招收極少數的臺灣人，例如郭琇琮就讀臺北一中期間，就曾經受到日本人的欺侮，當時郭琇琮萌生抗日思想，並且試圖反抗，不過漢人學生在臺北一中的數量比例過少，難以形成具規模的反抗勢力，反日思想更難以傳播到校園的主流環境。

至於今天的成功高中，在日治時期為臺北二中。臺北二中的學生主要是臺灣漢人，也招收少數的日本人，不過校方在政策上較袒護日本人，因此校內臺籍學生不滿學校政策，進而萌生反抗思想。由於臺籍學生在校內有一定比例，因此比起臺北一中，較容易形成有規模的反抗勢力<sup>7</sup>，以畢業校友陳炳基的口述「…日本特高(註:特別高等警察,二戰結束前的秘密警察)發覺在臺北二中有一部份臺灣學生…共謀組織以『臺灣脫離日本』為目的的秘密結社。同年四月二十五日…舉行結社成立典禮，會中議決『茲依革命手段將臺灣脫離日本國統治之下…』同時決定以『排斥日本人』當前的行動方針…」<sup>8</sup>可發現，當時臺北二中校內出現以剷除日本勢力，排除日本人為目標的結社。

### 第二節 青年學生參與二二八事件的背景

雖然日治時期臺北二中的抗日較臺北一中激烈，但中華民國收復臺灣之後，臺北一中與臺北二中均成為臺灣人的學校，懷抱著對祖國的期待與日本現代化教育的啟發<sup>9</sup>，青年學生們無不關心國事，期許社會政治煥然一新。

然而戰後初期，陳儀領導的行政長官公署厭惡充斥日本風格的臺灣社會，認為臺人受到奴化。此外政府強力推動中國化教育以及留日臺人回鄉就

<sup>6</sup> 建中創校百年的紀念刊物《建中世紀》出版於 1998 年，即以 1898 年(臺北一中的創校年份)作為基準。

<sup>7</sup> 李禎祥〈政治犯濟濟 成功鬥魂永流傳〉。新台灣新聞周刊，633(2008)，頁 56-57。

<sup>8</sup> 藍博洲《沉屍流亡二二八》臺北市：時報(1991)，頁 72。

<sup>9</sup> 李思儀〈二二八事件期間雲嘉南地區青年的反抗運動〉，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2018)。頁 111。「…首先要求殖民地朝向『日本人化』的社會改造…不分族群差異地共享公共性、公德觀念的價值…此公共觀念是日本帝國文化統合的國民精神思想內涵，在日治後期的戰爭動員轉化成集體主義的國民道德…戰後，轉換政權之際，已被灌輸公共意識的台灣人，面對來自『祖國』的新政府…更具體來說是雙方對於國家意識上的差異，缺乏公共觀念與統治力薄弱的前近代中國政府，讓台灣人民興起如欲『建設新臺灣』…」顯現學生們受到日本現代化教育的影響，脫離日本統治後產生「翻身做主」想法，對於新政府帶來的新政滿懷期待，因此懷抱政治改革的熱忱。

學政策，日中學制銜接的問題一一浮現，甚至出現外省籍教職員強行掌控教育系統而衍生出種種弊端<sup>10</sup>。糧荒、國共內戰等外在因素也讓行政長官公署承受巨大壓力，許多的表現被臺灣人視為施政不當，青年學生更是經常討論時政，由此可知，許多臺灣學生在二二八事件以前早已不滿當前局勢，長期積聚的不滿情緒則在 2 月 28 日的緝菸血案後爆發出來。

在二二八事件前發生的澀谷事件<sup>11</sup>及沈崇案<sup>12</sup>也助長學生運動熱潮。以澀谷事件為例，臺大學生郭琇琮和陳炳基就曾經動員學生抗議；沈崇案則是導致臺大、延平學院、建中、成功中學等學生聯合發起請願<sup>13</sup>，這些事件的發生，都為二二八事件的學生行動埋下伏筆。

### 第三節 兩校參與的情形

自從查緝私菸引起血案，點燃二二八事件後，青年學生用許多方式參與運動，以臺北市為例，社會賢達商議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嘗試與行政長官公署協商，期以用和平方法解決爭端；另一方面，應臺北市長及警察局長的要求，青年學生組成忠義服務隊來維護臺北市區秩序，當時參與者有千餘名學生，然而總隊長許德輝是保密局臥底，隊員當中混雜流氓份子，肆意挑起事端，製造國府出兵鎮壓的藉口，參與學生多不知情，事後更成為代罪羔羊，其辛苦搜尋的武器大多被高層收繳，導致學生無法使用武器維持秩序。<sup>14</sup>除了上述體制內的方式外，也有青年學生利用體制外的手段參與事件，例如：郭琇琮的地下的武裝抗爭；或者部分學生被指控襲擊一些公家機關，只不過其目的並非真正反對政府，事後這些人多半被記錄搗亂秩序，上述搗亂秩序的活動不屬於合法活動，不過即使作為反抗者而言，程度不及於地下武裝，也缺乏具體而深層的行動目標。

二二八事件中，在檔案正式被紀錄的建中學生有 4 名：吳沃熙、郭國純、李德昌、陳炎陳，其中李德昌被指為建國中學學生隊總指揮，有「奸

<sup>10</sup> 歐素瑛〈戰後初期臺灣中等學校之學風與訓育(1945-1949)〉，國史館學術集刊，2(2002)，頁 214-254。

<sup>11</sup> 澀谷事件：1946 年，在日臺灣人與日本警察發生衝突，該次衝突導致部分臺灣人死傷，十四名臺灣人被移送法辦，當時法院將臺灣人判刑(註：當時日本戰敗，政權暫由盟軍託管，司法體系則由美軍主導)，隨後遣送回臺。雖然無法得知何方先行出手，不過被認為可能起因於臺灣和日本攤商的利益衝突。當時臺灣社會不滿判決結果，紛紛上街抗議，出現小幅反美學潮。由於該次衝突發生於日本東京澀谷，故得名澀谷事件。

<sup>12</sup> 沈崇案：1946 年，北京女大學生沈崇在回家途中遭到美軍擄走並且強暴，事後交由美軍判決，此事經由報社披露，青年學生聞訊大為不滿，許多城市爆發大規模反美學潮，最終造成學生徹底不信任政府，間接導致國民政府內戰失利。

<sup>13</sup> 藍博洲《沉屍流亡二二八》臺北市：時報(1991)，頁 78-82。陳翠蓮《二二八事件與青年學生：二二八事件檔案專題選輯》臺北市，檔案管理局(2005)，頁 5。

<sup>14</sup> 藍博洲《沉屍流亡二二八》臺北市：時報(1991)，頁 85-88。陳翠蓮《二二八事件與青年學生：二二八事件檔案專題選輯》臺北市，檔案管理局(2005)，頁 25-26。

匪嫌疑」，其他三名則被認為攜帶武器企圖襲擊警察大隊及陸軍病院<sup>15</sup>，最終四名學生皆遭指控搶劫及預備強佔公署等罪名，四名學生皆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和緩期五年<sup>16</sup>。建中教師則以校長陳文彬代表。二二八事件發生前，陳文彬作為建中校長之餘，同時擔任人民導報主筆，時常發表政論，針砭時弊，爾後二二八事件發生，人民導報因為批評政府統治遭到查禁，陳文彬則被通緝，因此暫時避居友人住所。但是，聽聞上述四名學生參與事件遭到逮捕，學生家長陳情希望釋放小孩，警備司令部人員宣稱必須由校長出面方能釋放，爾後陳文彬決定出面會見司令，學生因此獲釋，但是陳文彬也遭到逮捕。政府控訴陳文彬利用廣播煽動群眾，要求省教育廳予以行政處分，直到行政長官公署改組為省政府方能釋放<sup>17</sup>。

上述四名學生被指控襲擊公家機關，因此在學生行動中理應被歸類為搗亂秩序者，不過在展覽《二二八事件與校園-事件中的建國中學》當中，其中三名學生對於此罪名加以否認，吳沃熙主張自己是學生代表，前往參加會議的途中遭到士兵攔截，後遭屈打成招。郭國純主張在住家遭人帶走，也被刑求。李德昌表示自己當時身為自治會幹部，協助維持秩序，之後被警察帶走。<sup>18</sup>。其他資料也有指出建中學生參與忠義服務隊或是地下抗爭，不過參與者姓名未能紀錄於檔案上<sup>19</sup>，未做徹底調查。另外，以建中校友來說，則以郭琇琮為代表，當時郭琇琮選擇使用地下抗爭的方式參與事件，由於當時地下抗爭未被查獲，因此郭琇琮得以存活，政府調查檔案也未見當時郭琇琮參與的資料。

成功高中的參與者也分成校友以及在學學生來描述。校友陳炳基中學時期就有反抗當權的思想，先前也參與過學生運動，二二八事件抗爭後，他鼓動臺大法學院(原本的法商學院)學生抗爭，前往專賣局參加示威，試圖佔領廣播電台，向長官公署推進<sup>20</sup>。之後，他參加了幾次大專院校學生代表會議，發現許多學生受到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吸收，負責維持治安的學生隊伍遭到政府利用，行政長官公署一面和談，卻也一面密電派兵鎮壓，因而認為依然必須武裝鬥爭，遇到地下黨人李中志後決定合作，並且開始串聯地

<sup>15</sup> 〈警總致白部長代電 附件三 在押暴動人犯名冊〉(1947) 出自國史館主編《二二八事件文獻補錄》，臺北市：國史館(1994)，頁 172,184,185。

〈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陳儀報告 附件三 在押暴動人犯一覽表〉(1947) 出自國史館主編《二二八事件文獻補錄》，臺北市：國史館(1994)，頁 208,238。

〈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拘押人犯表〉(1947) 出自國史館主編《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六)》，臺北市，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頁 314。

<sup>16</sup> 〈警總致國防部代電 附件一 已決暴動人犯名冊〉(1947) 出自國史館主編《二二八事件文獻補錄》，臺北市：國史館(1994)，頁 244。

<sup>17</sup> 藍博洲《沉屍流亡二二八》臺北市：時報(1991)，頁 285-298。

<sup>18</sup>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主編《二二八與校園--事件中的建國中學》臺北市：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21)，頁 24-26。

<sup>19</sup> 藍博洲《沉屍流亡二二八》臺北市：時報(1991)，頁 85-88。陳翠蓮《二二八事件與青年學生:二二八事件檔案專題選輯》臺北市：檔案管理局(2005)，頁 25。

<sup>20</sup> 藍博洲《沉屍流亡二二八》臺北市：時報(1991)，頁 83-88。

下武裝活動<sup>21</sup>。

3/5 日凌晨，具有留學日本背景的另一名學生運動幹部李中志主導的作戰計畫啟動，陳炳基的部隊在建中集結，成員也以建中學生為主，因為校長陳文彬作風開明，因此對於集結行動未加以干涉，集結完之後，他們計畫攻擊軍械庫，再攻擊警察局和憲兵隊，最後進攻行政長官公署。不過卻因為行動信號沒有發布，總指揮部發布停止行動的命令，於是只好回到建中解散隊伍。此時國軍已經入臺鎮壓，武裝起義終究未能付諸實現，所有人開始分頭逃亡。陳炳基原本想要接觸中共在臺地下組織，並且發展「新民主同志會」的活動，不過遭到查緝，只好持續流亡，最後更離開臺灣<sup>22</sup>。此外有紀錄姓名的校友還包括吳克泰、潘淵靜、黃雨生、黃弘毅、李蒼降等<sup>23</sup>。

至於成功高中有在檔案紀錄的在學學生則有馬學雄、張茂雄、林欽義、林肅恭、李英棋、楊錫明、許鴻禧、鄭文田、黃瀧雄、陳定泰、王家榮、王麗水、干文凌等。其中，除了王麗水、干文凌擅自盜用公物(鋼盔)外，其餘皆被控訴參與搗毀訓導處，其中又有多人前往訓導主任宿舍騷擾<sup>24</sup>。校方對於這些人分別作出不同懲處，其中馬學雄、林肅恭、李英棋、王家榮、干文凌皆被開除學籍；許鴻禧、鄭文田、王麗水、林欽義以及陳定泰則是被記過，並且填具保證書<sup>25</sup>。值得一提的是，在學學生當中，也有部分學生因為保護學校老師或者協助學校受到褒獎，詳細的名單則有：廖清源、陳德星、陳恆斌、陳燦樟、李子貴、劉兆禎、陳德全、高忠烈、陳俊連(3/1 曾護送校長何敬燁)；方逸龍、廖清源、余石麟、李光秀(3/3 日曾至本校訓導主任住宅保護)陳德全(暗中協助學校)；陳有義、黃景坤(保護外籍教師)；李大熊、李克聰、古賢基、陳再添、梁景榮(替先生送信並協助返家)；陳仁焜(保護外省同學回家被毆打)，除了陳仁焜獲獎 1000 元之外，其餘全數記功<sup>26</sup>。

依照上述資料進行分析，發現兩校在校生在二二八事件期間，多半只是在校內製造騷亂，其參與者最重也只是遭到退學處分，也有學生保護他人受到讚揚，與反抗行動已無關連。反之，校友的反抗行動則是比較積極，甚至策畫攻打多個政府單位，可見其對抗政府之決心，不過，這些參與的校友在二二八事件當下並未被政府抓獲，因而未作成筆錄，直到後來戒嚴時期，有

<sup>21</sup> 當時郭琇琮在二二八事件期間，與陳炳基、李中志等人一同參與串聯 3/5 日那場武裝反抗的作戰計畫。

<sup>22</sup> 藍博洲《沉屍流亡二二八》臺北市：時報(1991)，頁 57；86-88。

<sup>23</sup> 藍博洲《沉屍流亡二二八》臺北市：時報(1991)，頁 72-88。

<sup>24</sup> 〈臺灣省立臺北成功中學「二二八」請懲員生調查表〉收錄於歐素瑛、李文玉主編《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臺北市：國史館(2002)，頁 509-510。

<sup>25</sup> 歐素瑛〈二二八事件對校園的衝擊〉，刊載於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編《台灣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國際研討會》，臺北市：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19)，頁 103-104。

<sup>26</sup> 〈臺灣省立臺北成功中學「二二八」請懲員生調查表〉收錄於歐素瑛、李文玉主編《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臺北市：國史館(2002)，頁 507-508，511。歐素瑛〈二二八事件對校園的衝擊〉，刊載於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編《臺灣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國際研討會》，臺北市：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19)，頁 103-104。

人因為涉及共產黨地下組織的案件被捕獲或者被迫逃亡<sup>27</sup>。

綜合上述資料，自日治時期，學生即培養關心國家的情懷，直到臺灣光復，兩間學校以臺灣人為主，二二八事件爆發之際，兩校基於關心社會時事，皆以各種形式參與事件，並未缺席，參與程度而言則以成功高中校友的抗爭最為活躍。

---

<sup>27</sup> 〈(39)安澄字第 2806 號〉收錄於李敖編《安全局機密文件 歷年辦理匪案彙編》上卷第 2 部，臺北市：李敖(1991)，頁 77

〈(39)安潔字第 2517 號〉收錄於李敖編《安全局機密文件 歷年辦理匪案彙編》上卷第 2 部，臺北市：李敖(1991)，頁 6。

〈(42)安度字第 156 號〉收錄於李敖編《安全局機密文件 歷年辦理匪案彙編》下卷，臺北市：李敖(1991)，頁 332。

黃雨生、李蒼降、黃弘毅分別涉入簡吉案、鍾浩東案、李瑞東案，此三人皆被判處死刑。吳克泰、潘淵靜兩人逃離臺灣，未被抓獲。

## 第三章 1950-1970 年代的兩校校風

### 第一節 學校政策的發展差異

經過日治時期的塑造養成，以及學校師生接受二二八事件之洗禮，校方與政府意識到青年學生反抗的力量，同時因應國共內戰的大陸戰場逐漸失利，開始收緊校園風氣。對於學生行為，政府歸咎於其思想受日本荼毒，導致台人詆毀中國，因此政府命令學校要控制學生思想，例如：1.限制學生集會自由 2.要求外圍團體(例如：校友會或者其他政治壓力團體)不得干預校務 3.推動懲戒條例，規定參與者的相應處分 4.全體學生須表態經歷與立場 5.加強精神教育(譬如：推行三民主義、中文教育、根絕日本思想、增強導師制、軍訓)等，制定生活規範(升旗儀式、朝夕會、實行週會制度)以便於對學生進行學業與生活指導。上述訓育政策頒定的目的在於消除學生的反抗思想，讓國民自學生時代即灌輸服從政府的意志，以維護政局的穩定<sup>28</sup>。

政府也調整校方高層的人事結構，其中，派任校長人選是觀察校風轉變的一個方法，因為校長可以決定校務政策的整體方向，以及學生的治理方針。以建中來說，正如前述，由於有紀錄在案的這些學生實際上最重只被判處有期徒刑 2 年，代表這些學生雖然有參與行動，但是情節較輕，剛好政府派任偏向自由開明的賀翊新(任期:1949-1955,1957-1967)擔任建中校長，賀翊新畢業於具有自由風氣的北京大學，因此政府這次的人事案可說是某種程度地信任建中學生之自制能力。而在成功高中為了有效控制學生思想，上級派任潘振球(任期：1950-1956)擔任校長，潘振球為國立師範學院以及中央幹部學校(三青團幹部培養的學校)畢業，就任前也待過軍方，不同於建中，政府派任具有軍務，黨務背景的人士擔任校長。

拉長時間來看，以建中三位任期較久的校長而言，賀翊新畢業於北大，思想多少帶有自由開明的性質；崔德禮(任期：1967-1972)曾經就讀西方傳教士開辦的學校，之後又接受中央幹部學校的教育，因此融合西方的觀念以及黨國教育；黃建斌(任期：1973-1986)則是具有師範學校或黨務背景，與成功高中無異。至於成功高中方面，潘振球畢業於國立師範學院及中央幹校，其他三位校長薛光祖(任期：1956-1964)、劉芳遠(任期：1964-1973)、李大祥(任期：1973-1986)也具有師範學校或黨務上的背景。

### 第二節 管教措施及學生的言論與行動

在訓導工作方面，不同學校針對學生的管教措施也有所差異。以成功高中為例，自從潘振球掌管校務以來，幾乎全面貫徹政府實施的訓育措施，依

<sup>28</sup> 歐素瑛〈戰後初期臺灣中等學校之學風與訓育(1945-1949)〉，國史館學術集刊，2(2002)，頁 214-254。

據校方在 1956 年編制的《臺灣省立成功中學十周年紀念》<sup>29</sup>，即說明訓導教育的重要性，比如引述總統訓詞「過去大陸缺乏注重生活及人格修養的訓導教育，是革命失敗的因素」咸認中共亟欲摧毀訓導體制，顛覆中華民族倫理文化。其中，愛國教育被認為是訓導的基本工作，認為必須堅定三民主義的中心思想，培養學生的愛國熱誠，才能給反共復國提供保證，使一切思想精神有所依歸。

另外推行導師制也是訓育工作的重要政策，用於改造個人主義及自由放任學說造成世風日下、人心頹喪的現象(類似於現今所謂：「學生沒有學生的樣子」等語)。在生活常規的管理方面，注重強制性訓誡管理，以量化方式評估學生操行以及相應賞罰，且實施軍事訓練。學校有立場地支持社團發展，甚至還有時事研究社，尤其鼓勵參加救國團及童軍。

各週的品德教育皆有不同主題，但是明顯偏重愛國教育，實施時間超過一個月。學生通常還有德行自評表，其中，還會評估是否發揚民族精神(甚至有不愛國或者對三民主義信念動搖的選項)，旨在自我檢討對政府是否絕對忠誠。獎懲部分，只要鼓動學潮、毀損國旗、不知尊重元首者、知匪不報都會被開除，發表不當言論或者閱讀查禁書刊則會被記大過(不當言論的標準不明確，書刊被查禁的因素有可能包括政治原因)<sup>30</sup>。

國民黨全面進駐學校，負責學生言行管理，在校內辦理軍中服務和勞軍活動，當時校風也強調刻苦自勵，讓學校的整體風氣宛如「臺北成功嶺」(成功嶺為新兵訓練的營區，比喻該校風氣逐漸帶有軍事特質)，此類重視軍訓及民族精神教育之風氣直至解嚴初期(1990 年)依然沒有太大改變，並且以愛國教育引以為傲。值得一提的是，日治時代台北二中的校訓「實質剛堅」在潘振球主政以後，改成「愛國家,求進步」可見其致力於宣揚愛國教育的理念。

當時的學生意見的表達權利受到校風等大環境的限制，其發表之言論較為支持政府，以目前找到年代最久遠的《成功青年》86 期(1971 年 11 月出版)<sup>31</sup>為例，當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刊出的社論當中就有幾篇支持政府「漢賊不兩立」政策，並且譴責聯合國「排我納匪」的文章，此刊物也為了切合上述主題，特別刊出總統文告<sup>32</sup>。另外徵稿啟事也註明文章需要「思想純正」<sup>33</sup>，可見投稿的文章需要經過思想審查方能刊載；其編後語也寫道：「…本學期學校通知我，要我擔任『成功青年』的指導老師…為了不負學校

<sup>29</sup> 成功高中校方編制的《臺灣省立成功中學十周年紀念》刊載於楊蓮福、陳謙所整理的《私藏民國時期暨戰後臺灣資料彙編(文教篇)第 17 輯》，新北市：博揚(2013)。

<sup>30</sup> 臺灣省立臺北成功中學《臺灣省立成功中學十周年紀念》臺北市：臺灣省立台北成功中學。(1956)。收錄於楊蓮福、陳謙整理《私藏民國時期暨戰後臺灣資料彙編(文教篇)第 17 輯》，新北市，博揚(2014)。頁 166，243-246，340-341，344，349-357，387-389。

<sup>31</sup> 《成功青年》於 1953 年創刊，但是 86 期以前的期數皆已不存。

<sup>32</sup> 陳亮漢〈反對共匪混入聯合國大會有感〉《成功青年》86(1971)，頁 9。席藍田〈堅守五大信念，邁向光明前途〉《成功青年》86(1971)，頁 10-11。〈蔣總統文告〉《成功青年》86(1971)，頁 4。

<sup>33</sup> 《成功青年》86(1971)，頁 40。

的殷切期望…同學們的熱烈愛護，我只好竭盡棉力，去協助同學共同展開這項工作。…」<sup>34</sup>可見當時成功青年有老師的指導，順帶擔任審查文稿的角色，並非完全由學生自主編採，其編輯與出刊的內容，也要符合校方的期待。《成功青年》第 87 期(1972 年出版)同樣也有許多支持政府或是宣揚三民主義的言論，其編後語也顯現出當時師長依然對刊物的編輯進行指導<sup>35</sup>。此外刊載的文學作品(譬如：詩篇或者抒情類作品等)亦不乏以政治事件作為題材，立場也親近政府(譬如：〈鐵幕趣談〉、〈孫猴子大鬧天宮〉等等)<sup>36</sup>。除了上述政治性質的文章外，其他則大多圍繞學生的自身生活或者愛情、俠義類的文學作品，缺乏一些甚於突出，或者能夠彰顯獨特見解的文章。戒嚴時期畢業的學生，其思想受到當時環境保守校風的潛移默化，讚揚潘振球任內推行的愛國教育，以校友周玉山所述：「…潘校長後來賜告，愛國家是國民的天職，求進步是青年的責任；青年有前途，國家才見光明。我深然其言…」<sup>37</sup>顯現其深刻認同這類主張。

建中的校園風氣同樣在戒嚴時期有所收緊，主要是因為大環境的因素所致。依據校方於 1978 年編纂的《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章則》來說，其訓導綱要分成三大要點：1.厲行三民主義、反共復國的思想 2.推行中華文化、實踐民主法治以及 3.其他品德規範，例如：節儉、合作、勇敢進取、培養智育和體育等，其中，塑造意識形態被放在首位，可見其任務在訓導工作中的重要性<sup>38</sup>。而軍訓教育，則依照教育部制定的《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軍訓實施辦法》，增加許多生活上的紀律規範，例如：著制服時遇見師長一律行軍禮等等，其餘規定則是與前段成功高中的軍訓規範大同小異<sup>39</sup>。其獎懲標準同樣沿用臺灣省制定的標準，對於知匪不報、鼓動學潮、侮辱元首者會被勒令退學；而閱讀查禁書刊或者發表不當言論者，則會被記大過<sup>40</sup>。另外校方針對學生出版的刊物制定輔導辦法，其中第三章特別規定文稿須送交指導老師審閱，校刊則另須交由校方委派之審查委員進行審核，其內容有違背國策、散布謠言、損及師長及學校的名譽的內容都會遭到刪改<sup>41</sup>，上述規定對於學生的言論多半會產生影響，學生編輯刊物的權力因此受限，無法完全自主決定刊載的內容。

至於學生的言論來說，建中與成功高中同樣受到限制，以《建中青年》來說，刊載的多半屬於純粹應景類的單調文章(例如：國慶日等節慶的紀念專

<sup>34</sup> 一介〈編後語〉《成功青年》86(1971)，頁 118。

<sup>35</sup> 王德威〈編後語〉《成功青年》87(1972)，頁 126。

<sup>36</sup> 吉人〈孫猴子大鬧天宮〉《成功青年》86(1971)，頁 19。青〈鐵幕趣談〉《成功青年》86(1971)，頁 64。

<sup>37</sup> 周玉山(2022 年四月 3 日)〈成功中學記〉《聯合報》D3 版。

<sup>38</sup>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訓導綱要〉，收錄於《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章則》(1978)，頁 115。

<sup>39</sup>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軍訓實施辦法〉〈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軍事管理實施辦法〉〈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軍事管理實施細則〉，收錄於《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章則》(1978)，頁 157-167。

<sup>40</sup> 〈臺灣省中等學校學生獎懲辦法〉，收錄於《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章則》(1978)，頁 169-175。

<sup>41</sup>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學生刊物出版輔導辦法〉，收錄於《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章則》(1978)，頁 149-151。

題)，政治立場多半圍繞擁護政府，反共抗俄之類的主題，再加上刊物的內容需要經過校方審查，因此缺乏一些獨特或突破性的文章<sup>42</sup>，不過在 1966 年，建中青年 39 期(1966 年出版)出現兩篇社論，彰顯學生在校內的言論自由取得重大突破。首先是李子榮撰寫的〈言論自由的真諦〉，內容大概圍繞以下重點：1.強調「每個人均有說話或者不說話的權力」2.既然每個人皆為獨特的，就不應該強硬統一思想 3.發言以及將言論付諸實行的機會平等 4.單純發言不應被認為已著手實行，最後還認為人類的毀滅起源於對言論的壓制<sup>43</sup>。這些主張充分闡述自己對言論自由的渴望，尤其是指涉違反言論自由的行為這方面，似乎符合戒嚴時期政府的言行，譬如：強硬施行思想上的大一統以及將思想言論逕自認定已經實現(當時刑法 100 條的構成要件即包含思想犯罪)即使文章內容不免引發批評政府的聯想，但是這篇文章依然得以通過校方審查而刊載於校刊裡面<sup>44</sup>。第二篇為錢永祥撰寫的〈「自由的真諦」讀後感〉，旨在反駁訓導主任陳鑫對於自由的主張。訓導主任曾經在《建中青年》38 期投稿一篇〈自由的真諦〉，主張學生行為過於猖狂，因此訓導處必須對學生言行加以管控，學生頗有怨言，因此撰文解釋心中對於自由的定義，錢永祥則是對上述言論加以駁斥，例如：作者認為先有個人自由才能締造國家主權，而非訓導主任對於自由呈現倒果為因的詮釋<sup>45</sup>。此外他也提出以下觀點「普及的公立教育…是用來塑造人的模型…隨著他愈來愈有效和愈成功，自然由駕 O 人的身體，愈引發樹立 O 制人思想的專制主義…」批判當時教育體制之荒謬<sup>46</sup>。這篇文章勇於挑戰老師的想法，甚至意有所指地批判教育制度在風氣保守、強調尊師重道的時代實屬難得。儘管如此，刊載的內容依然必須符合刊物出版輔導辦法，過於「突出」的內容由於涉及國家尊嚴，通常都不會刊登。《建中青年》53 期編輯顧問陳彥豪表示，在戒嚴大環境的限制下，校方時常擔心學生言論會引起政府注意，甚至讓學生或者學校老師遭遇不測，不過，校方在學生遵守規範的前提下，盡量讓學生嘗試突破言論的尺度，這些挑戰尺度的嘗試，則以政治議題為主，顯現建中的自由風氣在當時風氣保守的臺灣，是個獨特的存在<sup>47</sup>。

---

<sup>42</sup> 林宗緯〈戒嚴時期之建中學生的言論—以建中青年為例〉，收錄於《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第九屆人文暨社會科學資優班專題研究論文集(上冊)》(2014)，頁 250-252。

<sup>43</sup> 李子榮〈言論自由的真諦〉《建中青年》39(1966)，頁 7。

<sup>44</sup> 林宗緯〈戒嚴時期之建中學生的言論—以建中青年為例〉，收錄於《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第九屆人文暨社會科學資優班專題研究論文集(上冊)》(2014)，頁 255。

<sup>45</sup> 錢永祥〈「自由的真諦」讀後感〉《建中青年》39(1966)，頁 98-100。

<sup>46</sup> 錢永祥〈「自由的真諦」讀後感〉《建中青年》39(1966)，頁 100。林宗緯〈戒嚴時期之建中學生的言論—以建中青年為例〉，收錄於《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第九屆人文暨社會科學資優班專題研究論文集(上冊)》(2014)，頁 256。另外引文中不清楚的文字以「O」表示。

<sup>47</sup> 顏品禎整理〈憶 1970 53 期編輯顧問—陳彥豪教授〉《建中青年》139(2014)，頁 132-135。林宗緯〈戒嚴時期之建中學生的言論—以建中青年為例〉，收錄於《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第九屆人文暨社會科學資優班專題研究論文集(上冊)》(2014)，頁 258。

## 第四章 結論

雖然日治時期兩間學校的校風的不同，主要是組成人口的差異，臺北二中因為漢人學生較多，加上當時日本人處於優越地位，因此助長漢人學生的民族主義情緒，造就反抗的心理，但是在戰後初期均關心時局，乃至於參與二二八事件。以建中與成功高中的參與程度而言，成功高中校友的反抗最為積極，至於其他群體(建中及成功高中的在學生等)的反抗程度則是不及成功高中的校友。二二八事件過後，政府亟需控制奔放的校園，加上事件發生恰逢國共內戰，在推行戒嚴體制的狀態下，校園的氛圍轉趨保守。政府替兩間學校派任不同風格的校長，影響不同校風的形成，而學生亦有不同的發展。

雖然正值戒嚴時期，政府如火如荼地在全國推行意識形態的宣傳以及軍事化的教育，影響學生的自由。在這個背景下，不論是《建中青年》或是《成功青年》這兩本校刊都不免出現一些愛國教育或者宣傳國策、讚揚領袖等千篇一律的內容，再看兩校編輯制度，《建中青年》與《成功青年》皆須經過審核，且有老師進行指導，學生尚未有完整的編採自主權。不過，藉由對建中或者成功高中校刊的觀察，兩校的學生言論表達卻呈現不同的發展，以建中來說，《建中青年》已經出現以言論自由作為訴求的文章，顯現當時建中已有相當程度的言論自由，學生已經有能力挑戰言論審查的限度，甚至公開談論自由的議題，可謂臺灣保守學風裡的突破；當時成功高中的校友反而是感念當時的愛國教育，認同「青年的愛國心是推動國家富強的力量」這般理念。由此可見，二二八事件以後，兩校學生依然保持關心政局的傳統，並未因為戒嚴令施行遭到徹底破壞，只是表現的形式有所差異：成功高中利用愛國心表達關注時事的熱忱，建中則是對於社會現狀進行反思。

隨著臺灣逐漸民主化，今日的兩間學校的風氣逐漸開放，學生能夠暢所欲言，談論任何話題，不過，筆者認為在享受自由學風的同時，不妨能夠看看過去的學長是如何生活？面對政治議題時又是呈現如何反應？當您充分了解後，或許能夠更加享受並且珍惜得來不易的自由。

## 參考文獻

- 王昭文〈二二八事件嘉義地區的學生與武裝行動〉，刊載於許雪姬編《二二八事件 60 周年紀念論文集》，臺北市：臺北市政府文化局(2007)。
- 《成功青年》86、87 期(1971)。
- 李東華〈二二八事件中的臺灣大學〉，刊載於許雪姬編《二二八事件 60 周年紀念論文集》，臺北市：臺北市政府文化局(2007)。
- 李思儀〈二二八事件期間雲嘉南地區青年的反抗運動〉，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2018)。
- 李敖編《安全局機密文件 歷年辦理匪案彙編》(上、下卷)，臺北市：李敖(1991)
- 李禎祥〈政治犯濟濟 成功鬥魂永流傳〉。新台灣新聞周刊，633(2008)。
- 林宗緯〈戒嚴時期之建中學生的言論—以建中青年為例〉，收錄於《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第九屆人文暨社會科學資優班專題研究論文集(上冊)》(2014)。
- 周玉山(2022 年四月 3 日)〈成功中學記〉《聯合報》D3 版。
- 《建中青年》39、139 期(1966、2014)。
-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主編《二二八與校園--事件中的建國中學》，臺北市：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21)。
- 國史館主編《二二八事件文獻補錄》，臺北市：國史館(1994)。
- 國史館主編《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六)》，臺北市：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 陳翠蓮撰文；檔案管理局編輯《二二八事件與青年學生:二二八事件檔案專題選輯》，臺北市：檔案管理局(2005)。
- 陳翠蓮〈二二八事件後被關閉的兩所臺灣人學校〉，刊載於許雪姬編《二二八事件 60 周年紀念論文集》，臺北市：臺北市政府文化局(2007)。
- 趙台生(主編)(1998)《建中世紀》，臺北市：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 臺灣省立臺北成功中學(1956)《臺灣省立成功中學十周年紀念》，臺北市：臺灣省立臺北成功中學。收錄於楊蓮福、陳謙整理《私藏民國時期暨戰後台灣資料彙編(文教篇)第 17 輯》，新北市：博揚(2013)。
-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章則》，臺北市：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1978)。
- 歐素瑛〈臺灣省立農學院與二二八事件〉，刊載於許雪姬編《二二八事件 60 周年紀念論文集》，臺北市：臺北市政府文化局(2007)。
- 歐素瑛〈二二八事件對校園的衝擊〉，刊載於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編《台灣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國際研討會》，臺北市：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19)。
- 歐素瑛〈戰後初期臺灣中等學校之學風與訓育(1945-1949)〉，國史館學術集刊 2(2002)。
- 歐素瑛、李文玉主編《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臺北市：國史館(2002)
- 藍博洲《沉屍流亡二二八》臺北市：時報(1991)。